

Ji NIAN WANG Yi RONG FA XIAN JIA GU WEN Yi BAI ZHOU NIAN LUN WEN JI

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百周年說文集



齊魯書社

序

王 宇 信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甲骨文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和内阁大库档案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四大发现”。自此以后,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和明清档案学等四门崭新的学问,从而为中国传统的“国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中国学者在深厚的国学基础上,与西方先进思想方法相结合,成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可矜耀世界书林的不朽著作。

今年,适逢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一百多年来,甲骨文由可供入药的“龙骨”,到学者们摩挲把玩的“古董”;由私挖乱掘的“断乱胡极”,到被纳入严格田野考古学的“科学发掘遗物”……可以说,一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一万多篇(部)甲骨学研究文献,凝聚了海内外4000多位学者的智慧、心力与追求。他们也和字字珠玑的十万片甲骨文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珍贵品。

为了全面继承和发掘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珍贵遗产,以使中华民族文化再度全面振兴,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等古文字专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需要。我国学者锲而不舍,追求创新,与海内外学者一道,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它一百年的辉煌。如

今的甲骨学,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学问。

“饮水不忘挖井人”。当我们在总结一百年来甲骨研究所取得辉煌成绩并思考新一百年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首先应感谢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几代前辈学者。以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等几代大师为代表的海内外甲骨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财富和可资借鉴的治学经验,成为我们前进的起点和基石。因此,在1999年,海内外学术界都在以不同形式在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这一学术界盛事。

先是在1998年5月,台湾师大和文语所在台北举行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诚为会议的组织者所说:“我们选在1998年召开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不代表我们认定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法,主要原因其实是大陆在1999年要召开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不希望两岸一年召开这个盛会,让甲骨学者赶场或为难。”“中国人过生日是算虚岁的,如果不赞成甲骨文是发现于1898年的学者,不妨把这场一百周年盛会当作是传统的过虚岁生日”;接着,在1999年4月,江苏南京举办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会议期间去江苏淮安拜谒了甲骨文史上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的作者和早年大收藏家的“刘鹗纪念馆”,还在5月底由江苏省文化厅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再接着,于1999年6月中旬在山东烟台举办了“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其间,专门有“王懿荣纪念馆”新馆开馆仪式;而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专门举办了“甲骨学一百年著作展和馆藏甲骨展”。在6月底,河南郑州举行了“河南省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座谈会”;7月中旬,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特展”,不少甲骨珍品与世人见面。8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安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

出席会议的 60 多位海外学者与 140 多位国内学者共聚一堂,达到了国际学术界纪念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的高潮。据悉,直到 12 月初,法国巴黎还在召开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而台湾一间大学,还在运作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会议。如此等等,表达了海内外学术界对甲骨学这一门新兴学问和甲骨文这一古老文明的极大热情。而多次会议推出的一批论文和著作,特别是一些大型巨著,诸如《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百年甲骨论著目录》、《甲骨文合集释文·来源表》等等,以及《甲骨学通论》(增订本)、《王懿荣集》、《百年话甲骨》等等著作的推出,更展示了中国甲骨学苑一派欣欣向荣,充满无限活力的景象。

在海内外举行的多次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1999 年 6 月山东烟台“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应是一次重要的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山东烟台地处黄海之滨,山川钟秀,人杰地灵。这里不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著称于世,而且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优秀子弟。武有著名的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文有清末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王懿荣不仅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伟大学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在 1900 年,八国联军直逼北京时,临危受命,以一介书生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京城的防务。他在北京东便门与侵略军进行惨烈搏斗后,终于在北京城破之际以身殉国,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的英雄。因此,在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故乡——山东烟台举行由他发现的甲骨文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议,这对以他的道德文章砥砺当世学人,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二,我们应该感谢烟台市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王懿荣家乡的人民,他们对自己家乡的优秀儿女是永远怀念与尊敬的。为开好这次学术研讨会,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烟台市拨出专款,重建和充实了“王懿荣纪念馆”,并由烟台电视台专门拍摄了《甲骨探秘》这一献给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先生的气势恢宏的专题

文献纪录片,并又对再现王懿荣以身殉国壮烈事迹的京剧《雄风祭酒》进行了精雕细琢。更为有意义的是,烟台市有关领导专门指派文化局的领导孙以勤、吕伟达等先生赴京,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商议,希望能邀请学会中有影响的专家出席烟台的会议。本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专家自1998年开始,就在准备出席1999年8月在安阳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会议,对临时接到的烟台方面的请求和安排感到有些突然(虽然烟台方面早就酝酿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还是深感烟台会议的意义重大。不少学者,就是怀着对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崇敬心情,接受邀请并又另撰文章的。其三,这次烟台“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研讨会”,出席的学者主要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因而代表性较强。而每位出席会议的学者,都毫不例外的撰有文章,因而会议的学术性很浓。在烟台市有关部门的支持、赞助下,以“三代文明研究”丛书之三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必将对海内外王懿荣和他所发现的甲骨文研究和探索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1999年,海内外学术界以不同方式纪念的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已经过去了,新的甲骨学一百年已经来临。已过去的辉煌一百年,为我们后生小子树立了较高的起点。而在新的一百年,我们应做些什么,又怎么做,问题就这样现实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只顾攀登莫问高”。让我们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道路,努力前进吧!

99.12.6



1999年6月18日王懿荣纪念馆新馆开馆剪彩仪式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新产业区的王懿荣纪念馆

目 录

序.....	王宇信(1)
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	王宇信(1)
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	田昌五(11)
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	杨升南(22)
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的伟大意义	陈炜湛(29)
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考古	刘一曼(36)
甲骨文发现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	高 明(50)
王懿荣与中国近代夏商考古大发现	高大伦(53)
王懿荣与金石学	王恩田(59)
王懿荣与山东金石学	孙敬明(67)
再论甲骨文的发现与探秘	吕伟达 邵伯奇(74)
文物保护的先驱者王懿荣	林仙庭(83)
一代宗师王懿荣	吕静波(89)
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文考	秦文生(94)
祭酒忠烈唯独一人	朱启新(99)
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刘志伟(103)
说甲骨、金文中的义字	葛英会(110)

甲骨文·殷墟·古史观·····	杜金鹏(116)
假设与求证·····	胡振宇(124)
论卜辞中的八卦方位·····	蔡运章(128)
殷墟文字形成假说·····	姜可瑜(156)
甲骨文毫地综考·····	李 民(165)
试释殷墟出土甲骨文字二十七则·····	徐锡台(175)
周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陈全方 陈 敏(179)
殷契斟释·····	党相魁(196)
甲骨文与中华文明史·····	李绍连(205)
甲骨文的发现对夏史研究的意义·····	王震中(214)
谈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文·····	齐 心(218)
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	刘士莪(222)
华夏古代文明的丰碑·····	杨育彬(234)
甲骨文“𠩺”非夏禹辨·····	商志龢(246)
甲骨文的发现与三代考古的发展·····	孙 华(274)
论甲骨文与汉字本义研究·····	林小安(283)
关于大汶口文化刻画图像文字的分布和年代·····	栾丰实(287)
略论甲骨学的形成及诸位大学者在其研究史上 的贡献·····	纪中良(299)
揭开甲骨文研究的新篇章·····	翟如潜(303)
甲骨文书法例说·····	张宗方(307)
甲骨文的艺术性和甲骨书艺创新·····	李永澈(327)
陕南商代铜器群与早期巴文化·····	尹盛平(357)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	张光明(366)

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一段疑案	邓 华(379)
汉字与中国文化	孙启新(384)
王懿荣书法艺术与民族精神	孙以勤 沈荣浩 吕伟达(422)
王懿荣其人及其书法艺术	胡元田 王其耀(428)
读王懿荣的篆书	杜霭华(437)
《爱国学者王懿荣》一文写作发表始末	王宜训(440)
逢盛世此馆方兴	王焕理(444)

附录一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100 周年活动贺电、贺信	(449)
---------------------------------------	-------

附录二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致辞	(455)
--	-------

附录三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王懿荣研究会组织名单	(470)
------------------------------	-------

附录四 王懿荣研究会章程	(472)
--------------------	-------

附录五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100 周年活动与会人员名录	(475)
--	-------

编后记	吕伟达(479)
-----------	----------

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

王宇信

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宣告了清王朝“洋务”的破产。但与清王朝办“洋务”的初衷相反,派出去的留学生,不少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认识了西方社会并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说。他们深感列强瓜分中国危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变法维新,有必要用西学和西方社会学说唤醒民众,以救亡图存。因此他们大量翻译和介始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以及哲学、自然科学知识等等,这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是一次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①。

中国传统学术,“既包含有时代局限性的内容,也包含有恒久价值的内容,既有陈陋的偏见,也有明锐的睿智;既有过时的糟粕,也有深湛的精华”^②。就在这严重的时期,中国有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作出了创造性的反映而开时代之先,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的转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③。

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

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的金石学,在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知

识的影响下,也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目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半纪的古物的出现与研究较之以前有了显著不同之处”,就是:(1)古物范围的扩大。“北宋所谓金石已不能包容这些新出现的古器物,金石学的范围实际上已发展为古物学”。(2)品类的专门化。附隶于金石范围内的一些古物,如陶俑、砖瓦等,“至此已各自独立地发展为分门别类的搜集与研究”。(3)“数量与内容的丰富”。自从阮元开收藏古物与研究古物的风气以后,许多私人大量收藏古物并整理发表,其数目远远超过宋代著录的古物。(4)“器物与铭文与文字学历史学的联系。北京时代的学者虽然利用铭文来解决礼仪制度的问题,虽然也考释文字,但晚清时代的学者因为有了乾嘉以来经学小学极度发达的效果,更进一步的利用铭文来作为文字发展条例与古代历史制度的新资料,对于经典史料的著作时代也开始重新加以考订”。(5)“石印术和照相术的输入。此以前的古物形制、花文和铭文的流传和印行,只限于拓本、雕板和少数的石印本;十九世纪的末叶,石印术与照相术的传入,大大的增加了研究与刊印的方便。”^④

如此等等。在近代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下,传统金石学向“古器物学”阶段的发展,不仅离近代真正科学意义的“锄头考古学”的产生已经为期不远,也为甲骨文的鉴定、收集和研究的准备了条件。

因此,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 1899 年首先鉴定并开始购藏甲骨文就不是偶然的了。1903 年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的出版和 1904 年第一部考释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的完成,标志着甲骨文走向中国学术界和研究的开始。其后,又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经历了识文字、断句读的阶段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罗氏(按:即罗振玉)于 1910 年有《殷商卜文字考》一卷,此书仅属推论。1915 年有《殷虚书契考释》一卷(后增订本改为三卷),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

不权與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仅與于此”^⑤。可以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和其后加以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实在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⑥。

而王国维在罗振玉之后,不仅在1917年完成了《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著录甲骨并作有考释,而且还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论文,标志着‘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⑦。与此同时,他又发表了《殷周制度论》,“此为对于卜辞作综合比较的研究之始”^⑧,从而拓宽了卜辞的研究领域。因此,“王氏之学即以甲骨文字之研究为其主要的根干,除上列四种之外,其他说礼制、说都邑、说文字之零作更散见于全集中。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⑨。

罗振玉、王国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处在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最高峰,这是因为他们在乾嘉以来学者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学术冲撞融合的大潮,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因为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传统研究方法“相异之处也很多。由于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所见到的材料(即罗氏所谓‘文字之福’)远比乾嘉诸儒要多得多,又由于他们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所以他们的治学方法具有与乾嘉朴学迥然不同的特征。”这就是:

(一)二重证据法。“以往研究学问,大都从文献到文献,以经论经,或以群经注一经,注来注去,弄得越来越繁琐”。此外,“当时又有一派学者一味的‘疑古’,将大量的文献典籍列为‘伪书’”。而罗振玉、王国维“既熟悉古籍文献,又拥有大量的地下资料,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于是别开生面,在中国学术史上揭开了新的一

页,此法即所谓二重证据法”。关于此,王国维在《古文新证》所述尤详,此不赘述。

(二)不迷信《论文》,对《论文》持批判态度。“罗、王以前治小学者莫不以《说文》为主臬,以许慎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但罗振玉、王国维“既参证《说文》以释甲骨文字,又不为《说文》所束缚,而能认出一批与《说文》字形不同的甲骨文,反过来纠正《说文》的谬误,这就比前人大大高出了一筹”,因而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就。

(三)“阙疑待问”的科学态度。罗振玉、王国维不强不知以为知,把那些暂不解决的问题“阙疑待问”,因而较“自宋以来,却颇有些人似乎是无字不识,无义不晓”的强解古字古义要实事求是的多。

二、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1908年,罗振玉访知甲骨文确切出土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地为洹滨之小屯”^③,并进一步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序”中,他考证出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为“武乙之墟”。在1914年进一步确定小屯“洹水故墟,旧称胙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④。诚如有的学者所高度评价的:“把甲骨出土的地点考证出来”,是“罗振玉的主要成就”之一。^⑤这就是其一,“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其二,“扩大了甲骨文的搜求,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其三,“扩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为考古学研究积累了资料。”其四,“确知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对确定小屯村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为晚商遗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确定,进一步促进了1928年以后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从而为殷商考古学的研究开了先河”^⑥。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史学”思潮中,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也被介绍给中国学术界,虽然当时对西方考古学的认识还很肤浅,但使中国学者对史学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考古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等方面有所了解,而对这门全新的学科有了一定的知识,开阔了眼界。^⑬正是由于在 1899—1928 年甲骨文研究“识文字、探商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在殷墟继续寻找甲骨文,“吾人感于殷墟甲骨有大举发掘之必要,乃先从调查入手”。中央研究院得到董作宾的调查报告,即安阳小屯村一带种种迹象“皆可为殷墟甲骨挖掘未尽之证”。“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挖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⑭。因此,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小屯村发掘甲骨文为契机,“与大量科学发掘甲骨出土的同时,伴出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为我国殷商考古学奠定了基础”^⑮。

我国历史时期的殷商考古学正是经过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阶段〔即第一次(1928 年 10 月)、第二次(1929 年 3 月)、第三次发掘(1929 年 10 月)〕的“萌芽时期”,进入了第二阶段〔第四次(1931 年 3 月)、第五次(1931 年 11 月)、第六次(1932 年 4 月)、第七次(1932 年 10 月)、第八次(1933 年 10 月)、第九次(1934 年 3 月)〕的“形成时期”;直到殷墟科学发掘第三阶段〔第 10 次至 15 次发掘(1934 年—1937 年)〕进入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成熟时期”^⑯。1928 年开始到 1937 年中止的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历时十年,先后十五次,不仅获得了大量甲骨文,而且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有重要的地位的。^⑰

与此同时,学者们把考古学研究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从而使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可以说是从安阳县小屯村殷墟的地面下发掘出来的”^⑱。董作宾 1933

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把晚商 273 年甲骨的一团“混沌”，犁然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和殷商文化研究中所普遍采用和承认的基本原则。“这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震聋发聩，钩深致远，为甲骨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②。从此，甲骨学研究由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草创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因此，“近代考古学方法的引入，使在金石文字之学影响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学研究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范畴，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③。

三、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的旗帜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疑古辨伪学者，继承了清末“新史学”的反封建精神，逐渐形成了以《古史辨》为阵地的“疑古学派”。应该说，继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④。特别是在 1923 年 5 月《读书杂志》第 9 期发表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的著名“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论断，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其巨大影响，“把一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的绝对可信的我国煌煌古史系统来一个从根予以推翻，等于是向史学界投了一枚原子弹，释放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向来只知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象晴天霹雳一样太出于想象之外。于是毁誉蜂起，大多数有着传统封建思想人痛心疾首，较少数有学术自由思想的人拍手叫好，形成了当时学术界很热烘的课题”^⑤。由于古史辨派学者的疑古辨伪，把传统封建思想借以立身安命的儒家经典和二千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伪“古史系统”彻底搅翻，必然要引起人们注意对新史料的搜集和上古史的重建工作。

这就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和组织者夏鼐教授所指出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④。另一位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教授也曾说过：“老的历史既不可靠，便产生了对新材料的需要，因而很多人寄希望于考古学，以考古学为‘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⑤。“安特生 1921 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从金石学的‘酝酿时期’萌芽而出”^⑥。进而以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为殷墟的考定和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搜求发掘甲骨文为契机，中央研究院自 1928 年至 1937 年的十五次发掘工作，使殷商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中国考古学者向地下发掘新材料的同时，也有不少对顾颉刚等学者的“工作有较高评价”的学者，“却总以他走的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其结论为是”^⑦。与顾颉刚等学者的“疑古”完全相反，罗振玉、王国维以甲骨文的搜求和阐发为基础，走上了“证古”、“释古”的道路。“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⑧。而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如上甲之次为报乙、报丙、报丁，而非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讹，大丁以文丁为是，均抉发了三千多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⑨。如此等等，“殷墟甲骨文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 19 世纪晚年，著名考古学者

德摩尔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 7、8 世纪，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结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⑧，即把中国有文字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与风靡学术界的“疑古”不同，王国维“证古”、“释古”。他最后的讲义《古史新证》从自己历史研究经验中总结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新的考证方法。这种实证的方法与清代的考据学又有不同。因为，清代考据的着眼点是对古代文献的考订，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王国维的学科视野广阔，他研究的是文字，社会制度、史前文物。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去对照研究，新材料是亲眼见到的事实，与书记载的东西互相参照，就易于增加客观性”^⑨。王国维提倡和实践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⑩。因此，王国维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果，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国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也是从罗、王的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开始的。号称“异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和《殷墟书契考释》为起点的。他在《我是中国人》（《海涛集》、《沫若文集》第 3 卷）中曾追述，在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见到的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是“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迫切想“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当他在东京文求堂见到《殷墟书契》的入门书《殷墟书契考释》以后，因买不起和借不出，故又去东洋文库，在一二个月内“读完了库中所藏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著作”。他并不讳言：“大概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精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⑪。因此，“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为指导，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